

臨床資料

匯 編

1975

江西省贛州市中醫院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党委是集体领导，什么都要管。卫生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要抓，党委也要研究卫生工作。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目 录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人民日报》社论 (1)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红旗》杂志短评 (3)
普及大寨县·····	《人民日报》社论 (5)
我国医学思想上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	张荣海 (7)

· 临 床 论 著 ·

中西医结合治疗麻疹 382 例临床分析·····	钱起瑞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踝关节损伤 60 例临床观察·····	禄来成 (22)
《舒冠活血汤》治疗冠心病 30 例临床疗效观察·····	王功榕 (29)
试论祖国医学对白喉的认识及其防治·····	周良云 (34)
应用“总攻”疗法治疗慢性胆囊炎 20 例临床小结·····	王功榕整理 (37)
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10 例治疗观察·····	林楠一 (40)

· 成 方 今 用 ·

《芍药甘草汤》临床运用体会·····	钱起瑞 (43)
《加减葛根芩连汤》治疗小儿泄泻 30 例临床报导 ·····	老中医杨式斋 赖启中 李 凌 (46)
《丁薏理中汤》治愈顽固性呕吐一例·····	周良云 (48)
《知柏地黄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口疮的体会·····	周裕仁 (49)

· 医 案 医 话 ·

陈国干医案《续二》·····	王功榕整理 (50)
陈国干老中医临证问病的经验·····	涂仲寿整理 (53)
饶庆昌老中医治疗乳痰的经验简介·····	谢仰贤 (57)
中气下陷的治疗体会·····	董世林 (58)

· 草 药 临 床 ·

草药临床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的疗效观察

.....	谢以珪 伍国利 罗宗翼 甘珍媛 (59)
草药治疗痢疾.....	刘鉴述 (61)
草药治疗急性结合膜炎.....	刘鉴述 (62)

· 个 案 治 验 ·

中西医结合治愈溃疡病合并大出血一例.....	王功榕 (63)
腺胀病一例治验.....	赖启中 (65)
产后发痉一例治验.....	老中医郭养和 刘生锦 (66)
肾结核及其眼病一例治验.....	胡其健 (67)

· 针 灸 按 摩 ·

按摩治疗冻结肩的临床介绍.....	张友珍 (68)
针刺中渚穴治疗肩部软组织疾病.....	吴祖传 (70)
针刺治愈脱肛病.....	关少南 (70)

· 教 学 园 地 ·

我对中医临证教学的体会.....	钱起瑞 (71)
从“疏肝理气”谈“异病同治”.....	余素琴 (73)
对小儿夏季热的治疗体会.....	邹定华 (76)
治疗麻疹的心得体会.....	张晋余 (77)
慢性肾炎急性发作的治疗体会.....	吴淑珍 (79)
发热治验 (三则).....	宗爱妹 邹兴明 (81)
小儿消化不良的治疗体会.....	黄琳野 (83)
水肿病治验一例.....	邹兴明 (84)



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捋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传》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传》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传》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传》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云。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

重視对《水滸》的評論

《红旗》杂志短評

为了开展对《水滸》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滸》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滸》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滸》，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滸》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滸》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滸》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滸》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滸》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地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

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普及大寨县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并确定要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会议对于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促进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伟大号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不仅大寨式的社队遍及全国，而且涌现出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农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农业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棉亩产跨《纲要》的省、市、县不断增加，南粮北调的局面开始扭转。我国粮食和大部分农副产品基本上保证了国需民用，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广大农村欣欣向荣，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前程似锦。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明年开始，我们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未来的五年，对我们国家极为重要。我们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有所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把更多的县建成象昔阳那样的大寨县，对于实现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宏图，进一步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有了坚强的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有了稳固的农业基础，我们国家就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县委既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就能把公社、大队都带动起来，使学大寨运动遍及每个角落。每一个县委都要认清形势，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都要加强自身的革命化建设，担当起建成大寨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大寨的同志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们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大寨的经验，象他们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寨的这个经

验，是带根本性的。不学这一条，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敢批，不敢斗，要建大寨县，是不可能的。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场伟大的改天换地的斗争。进行这样一场艰巨的斗争，没有干劲，不行；干劲不大，也不行。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没有干劲，干劲足不足，也是路线觉悟问题。有的同志“年年喊大干，就是怕流汗”，在他们那里，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有的同志满足于“贡献不大年年有”，在他们那里，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增长很慢。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要建大寨县，也是不可能的。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在领导班子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进行整风。要结合本县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大寨县的标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改变懦夫懒汉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揭露矛盾，找出差距。要经常查一查：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认真批了没有？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真正树立起来了没有？领导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真正做到了没有？总之，学大寨真学假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整风搞好了，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建大寨县就有希望。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和支持这个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农业真正放在第一位，切实加强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越是工业发达的地区，越要抓好农业。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省都解决了。在一个省、一个地区，能不能尽快普及大寨县，省委、地委的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省、地都要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并且订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对那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县，要一个一个地摸清情况，解决问题。对先进的县，也要帮助他们找差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全党同志，全体贫下中农和公社社员，国营农场职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国各行各业的同志，让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

（原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电）

我国医学思想上两条路线、 两种宇宙观的斗争

張 榮 海

中国独特的医学科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无疑地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也必然要反映到医学科学领域中来。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上的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并未停止，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尖锐激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待中国医学，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采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张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而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待祖国医学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极力排斥扼杀中医中药，为其崇洋卖国修轨铺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伟大

领袖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一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对中国医学的影响，肃清儒家散布的孔孟之道的流毒，正确评价法家的进步作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扼杀摧残中医中药的罪行，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阵地，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

信医与信巫的斗争

在认识疾病的问题上，儒法两家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以孔老二为祖师爷的儒家，为了维持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祭起唯心论的天命观做为其“克己复礼”的理论根据，竭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的邪说，把人的生老病死说成是由“天命”决定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提出了同儒家“天命观”相对立的唯物论的自然观，树立“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儒法两家这种尊天命与反天命的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反映到医学上就表现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斗争，是信巫还是信医的斗争。

儒家相信鬼神和巫术，把人生疾病说成是“受罪于天”，人得了病就只能向天祈祷，听天由命。实质就是企图论证人有尊卑贵贱，都是天命注定的，给人们戴上精神枷锁，要人们在天命面前俯首贴耳，忍受奴隶主的统治压迫。法家则不相信鬼神和巫术，他们运用唯物论的自然观解释疾病的原因。法家荀况在其《天论》中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意即只要调养周到，活动适时，“天”是不能使人得病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巨著《内经》是在儒法斗争极其尖锐激烈的战国时期成书的，它在论述疾病发生的病因时，指出疾病“不从天下、不从地生”，而认为是人体正气虚。如阴阳偏盛偏衰，气血不和，抗病力削弱，是发生疾病的根本原因，而风雨寒热、饮食、情志、起居过度等是致病的外在原因。《内经》还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就是说对迷信鬼神的人无法和他讲高深的医学道理。这不仅划清了医学与迷信的界限，且对鬼神致病的天命论者是个有力的回击。《内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医学摆脱了巫术迷信的束缚，它是在法家路线影响下，唯物论战胜唯心论，医学战胜巫术的产物。

在治病问题上，儒家迷信祈祷、祝由、画符念咒等巫术，认为祷告上天便可

却病。孔老二就是这么个家伙。《论语》有其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祷之久矣。”但是疾病并不因为他“祷之久矣”而消除，他又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一次，孔老二得病，季康子送药他服，孔却说：“丘未达，不敢尝”，生怕吃了药更加得罪于天，其腐朽愚昧的迷信思想已暴露无遗。而主张人定胜天的法家，需要医学科学为其政治路线服务，明确树立信医不信巫的思想。荀况反对巫术、祝由，认为那是“浊世之政”。秦越人主张有病早治，不把小病误成大病。《内经》更提出对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主张，而有“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之评。《内经》还说：“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种积极防治疾病的主张，闪烁着“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法家路线的光芒，是对儒家鼓吹天命观的有力批判。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当时的医学面临着如何继续前进和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是革新还是守旧，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实质上仍然是坚持唯物论的自然观还是坚持唯心论的天命观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在法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古代自发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内经》作者，把阴阳五行学说做为中医理论的宇宙观和

方法论，概括和总结已经累积起来的医疗实践经验，从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是中国医学进一步发展与提高的标志。

到了西汉末年，儒家路线占了统治地位，继承孔孟衣钵的反动儒生董仲舒，大肆鼓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叫嚷“人受命于天”。接过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贴上天命论的标签，说它是“天之道”，“天不变，道也不变”，甚至肆意篡改，牵强附会，从人体外部形态到内部器官，从结构功能到精神世界、社会关系都用种种神秘莫测而又至高无尚的“天”来解释。说什么“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与之相连也”。把阴阳五行学说拖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迷雾之中。

东汉前期，《论衡》的作者王充，同反动儒生董仲舒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认为“人之疾病希有不由于风湿与饮食者”“血脉不调，人生疾病”。勇于革新的华佗不畏儒学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封建礼教，曾多次为病人施行手术，治疗疾病。以他的医疗实践对儒家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的麻醉术和外科手术，已进入世界医学史上的光辉前列。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医学家反天命的进步传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自己的临证实践，总结了先秦两汉以来的医学经验，写成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抵制了董仲舒之流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坚持阴阳转化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把中国医学理论和临证实践密

切地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医学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初的李世民和不久以后的武则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行法家路线，促进了医学科学的进步。武氏修订颁行的《新修本草》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颁行的第一部药典。

北宋时，法家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运动，主张“新故相除”，直接改革了医学教育制度，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要学生去给“三学”学生及官兵看病。

在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思想影响下，金元时期，不少医学家敢于破旧立新，认为治病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株守一方以治万病。如张元素“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刘素素则打破儒医墨守成规的思想，在外感疾病的治疗上，大胆提出火热致病的病因学说，主张治用寒凉，为后世称为“寒凉派”的创始人。从学于张元素的李东垣，继承《素问》诸篇关于“饮食劳倦所伤”的论述，创立脾胃学说。认为脾胃诸病，不论是有余的饮食伤，还是不足的劳倦伤，主要矛盾在于“火与元气不两立”。而在治疗上必须正确掌握“益元气、泻阴火”的辩证关系，成为后世称为“补土派”的创始人。

明清两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加工泡制，其“信而好古”“法古无过”因循守旧的思想日益凝固。反映在医学上则是“祖述岐黄”，把《内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只能“取法乎上”“以经解经”。如有任何发展都被视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清代儒医陈修园就是这种顽固派，在他的《医学三字经》一书中，把后世主张医学革新的人都和他们的著述都诬

之为“后作者，渐浸淫，红紫色，郑卫音”。指责他们突破前人的法则是“规矩废，基于今”，攻击他们的著述是“间色乱正，靡音忘倦”。还有一个“自负古今无双”的唯心论者黄坤载，心目中只有岐、黄、扁鹊、仲景，除“四圣经典”而外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一个十足的颂古非今的顽固派。

但在同时，一些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医学家，他们要求进步，勇于革新的精神，冲破了儒家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如明代的李时珍摒弃科举，坚持上山采药，为民治病，经过27年的艰苦斗争和临证实践，越千重山，行万里路，亲自尝过许多草药，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八百余册，补正《本草经》中许多弄错和遗漏的药物，经过三次重大修改，终于编成了世界闻名的《本草纲目》。又如明末的医学家、《瘟疫论》的作者吴又可通过临证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当时流行的瘟疫，是由“戾气”经口鼻进入人体而引起，这种“戾气”既有“为病种种”的区别，又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的“特适”性质。这时他已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传染病是由各种不同的病原体引起。这种病因的见解，是对六淫学说的重大发展，在世界传染病、流行病学史上居于先进的地位。无疑是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儒医一种有力的批判。

清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王清任，他以“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的精神，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亲到义冢刑场观察尸体脏器，用四十年的功夫，观察了一百多具尸体，汇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著成《医林改错》一书，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有关人体结构的

著述不免还有错误，但他那种不怕“议余故叛经文”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对儒家阻碍医学发展的复古路线，作了深邃的揭露和批判。

继承发扬与全盘否定的斗争

1840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导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旧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包括医学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尊儒反法思想与崇洋卖国相结合，反映在医学上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崇洋媚外，把中国医学等文化遗产视为他们卖国求荣的障碍，采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妄图消灭中国医学。卖国贼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胡说一切要“尽仿洋式”“类依洋人成事”“事事依样葫芦”，大搞“全盘西化”。大汉奸汪精卫叫嚷“中国医士应全废，全国药店皆停业”。人民公敌蒋介石公然提出限制中医业务，禁止报刊宣传中医，不许中医办学校、出版杂志书报等消灭中医中药的反动法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余云岫对中医中药极尽诬蔑之能事，胡说什么中国医药“大部分还不能脱离野蛮民族的气味”。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对于那些崇洋媚外的反动派的卖国行径，中国人民与某些尊法反儒

的进步医学家一道，他们打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响亮旗号，和卖国贼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国人民反对消灭中医与卖国贼妄图消灭中医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医学领域里的反映。

与此同时，一些受尊法反儒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医学人士，开始探索沟通中西医的办法，提出彼此取长补短，融汇贯通的主张，试图通过“汇通”来维护和发展中国医学。这种思想比之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思想，无疑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提出的中西医汇通，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没有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他们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不免参杂着许多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因而他们的“汇通”难免牵强附会，因而是汇而不通。更不可能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开拓了光辉灿烂的前程。但是，在如何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中国医学的发展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医学一向极为重视，亲自制订了党的中医政策，对中医中药工作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早在1928年，毛主席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为革命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团结新老中西医药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阵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一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1958年又发出了“中国医药学

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光辉指示，高度评价了祖国医学在防治疾病，保证民族健康上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同时也看到，中医理论“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解释宇宙”的局限性，揭示了我国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因此我们在继续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为使中医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牢固基础之上，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医中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以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成就来丰富和提高中医理论、使之既保存中医固有的优点和特点，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创建的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途经。

但是，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却反道而行之。他们既尊孔、又崇洋，推行爬行主义，鼓吹洋奴哲学，对待祖国医学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叫嚷“中医不科学”“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推行排斥、扼杀中医的政策，妄图重演历史上消灭中医的丑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极大的提

中西医结合治疗麻疹382例临床分析

錢起瑞

小儿麻疹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它严重地危害儿童发育健康，特别在农村尤为突出。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好好地保育儿童”的教导，开设麻疹病床以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将1974年1月至1975年9月收治病例中记录完整的382例，作一临床分析，并对中医临床分型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提出意见，共同商榷。

临 床 资 料

382例中，绝大多数是麻疹中期伴有并发症，病情危重的“逆症”，且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

高了革命医务人员的思想觉悟。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飞跃发展。在医学的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可喜成绩，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

一、发病季节

病 例 月 份	1974年		1975年
	例 数	比 率 (%)	例 数
1—3月	55	34.6	22
4—6月	61	38.4	117
7—9月	27	16.9	84
10—12月	16	10.1	(未计)
合 计	159	100.0	223

由此可见，麻疹在我地区几乎全年均有发生，而以4—6月份为最多，其次是7—9月。而1975年前三季度收治病例比1974年全年的还多。

儒法两家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和将来，也必然要而且必然会在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开展两条路线、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就一定能三大革命运动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